



去年4月,我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参加美国科学院年会。后来,又被邀请出席了美国物理学会。5月,率北京大学代表团继续访问。6月中旬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作访问教授,做了近两个月的研究工作。随后,到加拿大参加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大会。大会结束后,访问了加拿大的大学。回国途中,应希图政府的邀请,访问了雅典大学。九月中回到北京。在国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学中渡过的。我先访问过的大,美国17所,加拿大和希腊一所,共21所。解放以后,我曾三次访美,唯有这次时间长。同美国的学者、华裔教授、我国派出的留学生和教师接触多,所以感受也较历次为多。这次,可以说,是怀着对中国的教育问题的思考在国外观察了五个月。

1952年院系调整,我从清华转到北大,迄今已近三十年。我从事高等教育五十多年,我的心是紧繫与大学相连的。特别是国家和人民迫切希望早日实现现代化的今天,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怎能不关心高等教育的改革?人民教师永远不能离开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岗位。现在,各地正在开展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我试图把在国外观察的心得与国内高等教育现实相结合,提出一些问题,与全国同行共同商榷。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以下谈到的美国大学几方面的情况,只能作为改革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参考和借鉴,不能全部照搬,有的还要当作教训来吸取。

在此必须指出,我们所访问的大学是美国著名的大,不是一般的大学。它们之间水平悬殊、差距很大。

我认为,一所大学办得好或不好,其水平如何,它的决定因素或根本标志之一乃是这所大学的教师阵容。教师是学校的主体,古今中外,绝无例外。

北京大学在过去曾集中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象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陈伯康、马寅初、马叙伦、李四光、翁文灏、葛利朴、王仁辅、李书华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所以她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内最高学府之一。美国的大学,过去一直由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芝加哥等校执牛耳。因而在这些学校里,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一批闻名于世界的教授。

比如,以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为例。在该校于十九世纪末成立初期,就请到迈克耳孙作教授,后来又有密理根。密理根到南加州筹建加州理工学院后,他的职位由普朗顿继任。在1934年又请到了意大利的费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就是1942年在费密领导下在该校试验成功的。他们四人都得过诺贝尔奖金的先后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培养了许多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

最近,加州大学(伯克利)有后居上之势。重要的原因和其标志乃是她“招聘”了一批最优秀的、具有先进科学思想、生气勃勃的文理等各科的学者。其中,有美国科学院院士73人,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四十人。他们是闻名于全球,走在学术最前沿的人。

又如,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助理教授以上共有千人,有150人是国家工程科学院或科学院士。

美国大学的教师,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三级。大学教师是从研究生毕业、取得学位的人中选拔的。大学毕业生直接进入大学任教,是不可能的(助教工作由研究生兼任)。研究生毕业,取得学位以后,多数人到大公司、企业、政府等各部门去就业了。另一部分,得到教授的招聘,在其名下从事科研工作工作,这样的岗位名为“博后生”(Post-doctor)。这样的人,从教授的研究经费中领取工资。从事“博后生”工作,一般三年左右。在这期间,学校和社会通过考察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的表现,来选拔人才。本人也在这岗位上上面工作,一面寻找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工作。如果有一个系的助理教授有了空缺,这个系选拔教师的唯一办法是公开招聘。公开招聘时,全国任何地方,任何学校的“博后生”或同等资格的人都可应聘。从应聘人员中选定教师,是由一些教授组成的委员会集体审核,表决通过的。经过这个途径,进入教授队伍的行列后,并不能获得一个“铁饭碗”。大学还要在助理教授这一层人中,继续考察和挑选。考察的内容有三个方面。其一,是教学工作的表现。其二,是研究工作的成就。其三,是对学校这个“小社会”的贡献(这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社会工作)。一名助理教授经过超过三年以上的工作,接受了以上三方面的考核,经过了系的委员会的审查研究之后,才能晋升为副教授。在美国的大学里有一句话:或是出版,或是毁灭”。如果没有论文不断发表,就得解聘。只有作了副教授之后,才有可能在大学中取得终身职(有的学校教授才是终身职)。副教授升为教授,要经过同样的考核和审查,一般时间要七、八年。

在美国,一名研究生毕业后,不论在“博后生”阶段,在担任助理教授阶段,甚至在担任副教授阶段,都有两个前途。在教学、科研工作作出贡献就可以升级。如果作不出贡献,特别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不出有水平的论文,就会离开学校,另选其它职业(或是本人另有高就)。这样的两个前途,不论对社会及学校来说,或对本人来说,是在“相互选择”。社会在挑选人才,个人在挑选自己合适的职业。学校乃至社会对人才的选拔,有很大的“空间”。我这里的讲“空间”,包括着地理和部门。美国的大学,招聘教师是不分国籍的。一个学系可有一半的教师不是美国人;一个研究所,一个学科的领导教师不是美国人的实例比比皆是。而教师个人,又时常在全国各大之间,乃至和国外大学之间流动。

当然,美国之间教师的流动,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所决定和制约的。这种流动也有它的副作用。教师常常不得不放弃科教书业也是有了个人利益和名利进行流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下,为了繁荣科学技术、发展教育事业,为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而进行必要的调整,特别要从政策上鼓励教师到边远地区去工作。

访 美 有 感

——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

周培源

总之,一所好大学,必须有严选良师的办法和传统,必须有选拔人才的条件。否则,人才就会在死水一潭中被埋没。而有些不称之才,又会占据本不应占据的位置。一所大学的人才,只有不断地严选和淘汰,才能在学术上打破保守,生气勃勃,不断前进。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选拔人才的途径。封建时代有科举,资本主义社会有竞争。我们应有一个优于科举和竞争的办法,这是使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前进的根本大事。

严选与淘汰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淘汰,就谈不上选择。选择当然有个标准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看人才,有我们的标准。“又红又专”必须是坚持的。如果我们只看其才,而不管政治标准,那将是很大的错误。另一方面,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有过不少“左”的错误。对人才的选拔,对教师的选定,曾发生过以“红”代专、以政治冲击业务的错误倾向,把科学、知识当作“白”的东西去对待,把知识分子看作异己力量。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学校选择教师曾有不问学术,把它当作单纯的人事工作去办的倾向。多年来,虽然大多数教师是称职的,但还承认,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确把一些业务上并不合格的人留了下来,又确曾把一些业务上很有前途的人才,安排到不能人尽其才的岗位上,甚至有才华的人才排挤出外。

在美国时,有个著名教授曾向我说:“中国人勤劳聪明,又有十亿人口,将来的科学、文化是属于你们的。”听了这些话,想到我们自己,十亿人口的大国,确应人才辈出,但实际上却并不理想。作为一个培养人才的教育工作者,深感不安。我们的大学应该总结“左”的错误教训:怎样在选拔教师,选拔干部时,不以个人的好恶,不以宗派的利害,而以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任人唯贤;怎样突破小到只有学校院墙这点大的“地理空间”,在人才的问题上,改变一潭死水的局面;怎样打破“铁饭碗”;如此等等。总而言之,要办好大学,就得在选拔人才这个根本问题上,打破一些旧框框。

我深有感触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

先从美国的著名大学(相当于我们的重点大学)说起。他们对大学生,有一套考试制度和挑选的办法。学生进大学后,一年级全不分系,有的二年级也不分。哈佛大学的教务长说:“进入哈佛的学生,就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不是那所大学的学生。”入校后,经过两年学习,学生可根据自己对大学的学习和工作的实践,提出自己的志愿。可以学文,也可以学理。入系后,发现和自己的志趣不一致,还可以转系。这是其一。

其二,学生入大学后,所学的课程,选择性是很大的。各校虽有各自的规定,但基本精神相同。以哈佛大学为例,每个学生要学16门历史学方面的课,8门文理学院的全院必修课,另外,8门课自由选修。这32门课,一般在四年内完成。

其三,对任何学科的大学生,都要要求必须学习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我另一个母校加州理工学院的院长说:“我们要求学生用20%的时间学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传统,因为我们培养的不仅是一个工程师、一个科学家,而最根本的,我们培养的是人。”“学生要学习文艺、历史、社会科学,他们都要懂社会和人,因为任何一个科学家,每天、每天都在和人、和社会打交道。”我看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化学学院的学生课程表,这个学院可供学生选修的文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有62门。从“比较文学”、“戏剧艺术”、“希腊的黄金时代”、“中国和日本艺术”、“欧洲绘画概论”、“音乐概论”、“古代哲学”、“现代康德哲学”、“还有‘考古学概论’”、“世界人口和经济”、“美国经济史”、“文化和历史地理”、“欧洲文明”、“加利福尼亚州”、“国家安全政治学”等等。

大学的任务是培养人才。这里,有两点必须考虑。其一,是社会的需要;其二,是必须按照受教育者的特点去培养,作到“人尽其才”、“因材施教”。一所好的大学,就是要使这两方面得到统一。

解放以后,我国高等学校的全国统一招生工作,是全世界规模最大、任务最艰巨、成效最卓著的培养人才的工作。我自己在1950到1959的十年中,曾分别负责过北京市、华北与东北地区,以至全国的招生工作,很有感受。但我们培养人的办法,也还有欠缺。学生入学前,先分系报考,入学后很难转系。在过去多年中,入学后整班地、上百人地按一张课表上课,按一个模式培养,而不能发扬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依据社会的需要、专业的发展、个人的志向与志趣,走上自己成长的道路。这些都有待改进。鉴于当前高等学校的情况,这方面不可能马上实行全面的改革,在维护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很多大学注意到这种欠缺灵活性的缺点,在选课办法上作了很多改革,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入学定终身的问题,由于最近几年入学人数激增,更有“发展”。现在,中学生考大学,学什么专业,报考哪个系,多是由学生家长的“报名卡”决定的。每到暑期前,“报名卡”盛极一时,相互传告。哪个学校、哪个系入学分数线是多少,哪个专业是“冷门”,怎样排列组合填写入学志愿为怎样,如此等等。一个人从事学术和将来的职业是这样决定的,这是很可怕的现象。

有人为报考定终身的办法辩护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有计划性。但是,制定计划的根据是什么?在会社会的问题上,资本主义条件下,是靠自由的市场调节来解决的。例如,计算机在当代成为生产、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关键,学生的志愿,想学

计算机的就多。这种调节,反应是灵敏的,但必有盲目竞争。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多年来,我们解决社会需求,是靠计划,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计划是很必要的。但实践证明,过去的计划,问题很多。我们在物质生产方面,吃了主观主义的“计划”的亏,已经够多了。在精神生产方面,主观主义的“计划”造成了多少人才被埋没,则是无法统计的。我们要在计划方面好好总结经验,在培养人的办法上进行改革,找出一条我国自己的道路,作到社会主义的计划性与“人尽其才”的统一。

在教育工作中我们自己也做过很多好的经验。解放后,我们的高等教育为国家输送了大批合格的人才,成绩很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自满。我们要总结出己的经验,对国外的教育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地进行改革。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我对美国大学教育感兴趣的第三个问题,是学术的现代化问题。

以加州大学(伯克利)的文理学院为例,它有42个系,此外,还有许多跨系的专门组,例如“生物统计学”、“神经生物学”、“逻辑学及科学方法论”、“人口统计学”、“佛教问题”、“社会福利”、“工业社会政治经济学”、“妇女问题”、“大规模通讯交流问题”等等,共26个。在系科设置上,他们有很多新兴科学和边缘科学。我们在这方面还很缺乏。

又如,只有1,700名学生的加州理工学院,它有六个学院,20个系。除生物、物理、数学及天文、地质及行星、化学及化工、工程及应用科学五个学院外,还设有一所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我们可以举出这个学院二、三年级学生的课程来说明他们怎样培养边缘学科的人才。这个学院的二年级学生的典型课程是大二数学(偏微分方程,概率及数学分析)、电力学及量子力学、微观经济学导论、宏观经济学引论及一些选修课。三年级学生要求学习中高级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货币、收入与增长,统计学,计算机模型化和数据处理及一些选修课(一年级的共同课则有数学、物理、半学年的化学或生物等)。这样的社会科学的学生,有较好的科学或工程技术基础。毕业后,可以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商业或政府管理部门工作。

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术上还存在着陈旧、落后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多年的“左”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例如,我们曾普遍给社会学、心理学扣上了资产阶级帽子的帽子,当时“白旗”未拔,使这两门科学中断了30年之久。“左”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现已为人们所承认;在教育战线上,要承认十年浩劫中的问题还较容易,要认识到现在还有什么“左”的影响,则是比较困难的。

第四个问题是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我在国外五个月,虽然十分关心外国大学生在想些什么,可惜和青年学生接触太少,只看到一些表面。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现在的生活方式和我们50年前在美国当学生时相比,有了很大变化。随之而来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也都有了变化。在一个生存竞争十分激烈、物质产品又十分丰富的社会里,多数青年想的是赚钱,企求的是享乐。对美国大学生的观感,是大多数不务功,拚命的只是少数。美国大学在业务的培养上,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但在思想、道德的教育上,即使从维护自己的社会制度来说,他们自己的不少教育家 and 科学家也是不满意的。

与美国的大学生相比较,我对中国大学生感到十分自慰和自豪。我们的学生的大多数,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勇于思考,努力学习。不论学习态度,思想道德,他们远远胜於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

但是,作为一代老教师,对于这一代大学生,从心里也有“担忧”之处。现在的大学生不同于解放前的大学生,也不同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大学生。1980年北大学的新生平均年龄17.25岁。从懂事的大、七岁时开始,在他们身边发生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他们生在动乱时期,入学于历史转折的关头。青年学生之所想,我们老一辈的人往往是不体会、不理解的。现在的大学生,思想有一定的混乱,每个学生所追求的也有莫衷一是之处。这是并不奇怪的。长期的动乱和重大的转折,对于原是一纸无张的青年,必然有这样的反映。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如果看到而又无所作为,那将是严重失职。

我们必须加强和改善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待青年人的思想工作,必须坚持“疏导”方针,按照四项基本原则积极加以引导,以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道德和党的优良传统去教育青年,带领学生去探索真理、抛弃谬误,帮助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能压制,更不能随意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有着严重的错误思想的学生是极少数,但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只要他不触犯刑律,我们必须立足于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最大努力去争取教育工作。对待青年人的思想工作,必须坚持“疏导”方针,按照四项基本原则积极加以引导,以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道德和党的优良传统去教育青年,带领学生去探索真理、抛弃谬误,帮助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能压制,更不能随意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有着严重的错误思想的学生是极少数,但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只要他不触犯刑律,我们必须立足于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最大努力去争取教育工作。我们在思想品德教育工作中,有过很多的好经验,应发扬。但也有不少错误和教训,必须认真总结,加以摒弃。

中国的青年学生是可爱的。他们经过勤奋学习,走进大学的校门,听从我们教育,又从我们的校门不断走向社会。他们是掌握祖国未来的人。作为他们的教育者,我们的责任十分重大。因此,我们自己也必须努力学习,提高觉悟,不断改造世界观,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高等学校的领导。

谈到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发展史,总讲到一

些奠基人,他们都是学术界有威望的。我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原是一所地方性的工艺学院,它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成为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源地,是经过了一些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辛勤培育的。他们是:海耳,他曾是美国当时最大的威尔逊天文台的第一任台长;诺埃斯,他也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过代理院长;密理根,他是学校的创办人和院长;摩尔根,他是生物学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杜勃利诺,他在第二次大战时,是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的领导。辐射实验室其实是雷达研究室,当时集中了全国4,000名科学工作者从事这项工作。其后,他又在加州理工学院任院长,并作了出色的建树;还有另一位院长布朗,也是物理学家,曾做过伯克利劳伦斯实验室的领导人之后,被卡特政府选为国防部长。美国大学十分注意它的领导,校长是在全国范围内物色的。最近,麻省理工学院曾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选一位合适的新院长。

这样的情况,世界上很多著名大学都是同样的。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蔡元培先生是北大校史中很有成就的校长。他本人在学术上很有造诣。他十分懂得:办好北大除大力提倡学术自由外,必须聘请许多具有革新思想和高深学识的人才到北大任教。他在北大组织了评议会、教授会,发挥教授的主导作用。他对北大的系科设置,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为了怀念蔡元培先生,我于去年三月曾在报纸上发表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的文章。

从国内外著名大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学校是一个搞学问的场所,而学术活动的特色乃是它的独创和革新,它的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和尊重实际的科学态度。每一位流芳千古的学者,总具有他人的特色。一所好的大学,也有她自己的风格。这一切都只能是由这所学校的校长、教授、教师队伍来推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就在这里。多年来,我们工作的缺点是不善于管理学校,而很少把推动学校的发展的责任交给教师。这样的领导方式,程度不同地束缚了学校的蓬勃进展。

我们在经济领域中,已经深感不懂经济,不懂科学而又掌握大权给国家所带来的巨大损害。“左”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中产生的弊端之一是强调“外行领导内行”,助长了官僚主义和瞎指挥。经济上的损失是有形”的,而教育工作的损失是“无形”的。所以教育战线上的“左”的错误更不容易纠正。

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对于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党对学校领导的倾向,必须坚决反对。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当前,在高等学校中仍要继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要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干部管理、党的建设和思想工作等方面的工作,做到党政分工,把日常工作、业务工作交给行政、业务部门去承担。极少数有条件的学校,也可以对实行校长制和党委起监督保证作用进行试点。在前面,我所提出的发展学校的学术和教育,要由学校的教师队伍来推动,这正是我们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工作。我们要加强党在学校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扩大干部队伍,并要善于团结,善于领导,大胆信任那些经过多年党的教育,学有专长,又有教学、科研实践经验,热心教育事业的了一大批教师。

解放以来,我国的高等学校在党的领导下,培养出大批优秀干部、科学技术与教学人员。今天,他们已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成绩是巨大的。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三十多年的教育事业,就不可能有今天进行四化建设的基础。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的,在我们的学校中,“左”的危害由来已久。不仅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它受害最深,知识分子被践踏到“八类”之下,科学、文化被打入九层地狱之中,而且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过多次失误。例如,1957年的反右派扩大化,伤害了不少知识分子;1958年的大跃进,学校也搞得很“欢”;1959年的反右倾,把矛头对着学校中的“党内少数”,并把大批又红又专的干部打下去;1964年的“社教”,还把“左”倾当作右倾去批。接着才来了十年浩劫。我们中的大多数虽饱尝其苦,但同时又正是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的“左”的错误拥护者,甚或是执行者。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广阔和深远的影,诸如外行与内行,知识分子政策,政治与业务,用人标准,培养人的办法,学术与政治等问题上的偏差与失误,要纠正它谈何容易?我们不要割断历史,似乎一谈今日,一切都对;过那时,又要重新估价。我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欲解三尺之冰,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我们没有必要去追究过去失误的责任。但是,作为学校的领导人,则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失误,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些失误,并把它当作教训来认真汲取。为了适应实现现代化的需要,高等教育必须改革。改革高等教育,不妨从选拔人才(教师队伍),培养人才(学生教育),活跃学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几方面着手,总结经验,认真分清路线是非,团结多数,进行总结而又稳妥的改革。这样作,也许教育事业会蓬勃发展,对四化会作出自己的贡献。我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教育事业必会发达兴旺。

“管理现代化系统讲座”开班

一千七百多名司局级领导干部参加听讲

中国科协、中央国家机关临时党委、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管理现代化系统讲座”,于3月28日上午在物资部礼堂开班听讲。参加听讲的有国务院各部委的司局级领导干部一千七百多人。这次讲座共分五讲:管理现代化理论导论;企业管理工程;最优化的“设计生产管理”一体化;科研管理的现代化问题;技术经济预测等。担任主讲的是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成员何健文、何国伟、邹海、骆韶俊、崔俊同志。

这次讲座于每周星期六举行,4月25日结束。讲座录音及资料汇编将由中国科协科技资料服务处负责供应。

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戴 逸

历史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国以来,我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彻底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要重视理论的作用,认真学习理论,加强理论研究,发扬理论的力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历史研究的阵地。“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两个口号,虽不那么完善,但曾起过积极作用。我们要坚持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则,同时,又要坚持理论的指导作用,我们主张“史论结合”。

就某个问题或历史问题发表的具体意见,当然也值得我们学习和领会,但是其中一些词句和论断由于种种原因,不一定完全符合于实际,我们切不可把它奉为不可改变的教条。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不是把革命导师说的话都当做可以信手拈来的套语和标签,不是去任意剪裁历史事实使之适合于某种理论图式,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占有大量史料,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革命导师的某些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长青的,它永远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从事建设、观察问题、研究学问的强大武器。

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历史研究的指导原则,但它不是保证百事亨通的灵符。我们必须奋发努力,收集史料,弄清史实,付出辛勤的、艰苦的劳动,才能比较正确地说明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在科学的道路上,只有不畏险阻、肯于辛勤地攀登的人,才能够到达光辉的顶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研究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却不能保证研究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摘取科学的果实。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原理,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靠空话是济于事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充分承认历史资料对于研究工作的重要,有些在真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才能够建筑辉煌的科学殿堂。历史学家必须搜集和掌握丰富的资料,进行整理、考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清除掺杂在史料上的重重迷雾,使史实显露其本来面目。史料的搜集和考订是史学研究中极其重要的部分,我们应该十分尊重

许多历史学家在史料工作上付出的劳动。这种工作过去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太少了,今后应该投入更大的力量。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片面地夸大史料的作用,认为历史研究仅仅是对史料的整理、考订,用史料学代替和取消历史科学。搜集和排比史料材料,考证某个记载的真伪虚实,是为进一步认识历史作准备,但不能把这一工作取代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历史的研究,一旦从收集和考订史料、排比史事进入到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之间确立相互联系,透过纷纭的现象深入本质、揭明规律的时候,研究者的历史观、方法论将起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观点和深邃的理论素养,研究工作必将举步维艰。

有一些人认为:历史科学只凭史料说话,不需要任何理论。甚至认为,理论的指导必然会带来主观断的弊病,反而会损害科学性的。因此,他们倾向于摒弃任何理论,标榜“无所依傍”和“超然独立”。其实,“只凭史料说话”,仅仅在某些陈述简单事实的很有限的领域中可以做到,例如某事件发生在某年某月。这类陈述也不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范围,当我们试图对历史过程作某种分析判断时,对一条史料也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就拿当前的学术争论来说,有些争论中,大家掌握的史料基本相同,而意见分歧却很大。“只凭史料说话”,也会众说纷纭。可见,对史料的陈述和解释,离不开各种理论观点的影响,这样才会对相同的史料做出不同的解释。完全不受某种理论影响的科学研究是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是接受哪一种理论观点的影响,用哪一种方法进行思考。马克思主义是最严谨、最完整的学说,它总结和继承人类最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并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作为自己的基础,因此和唯心主义的主观武断水火不相容。为了防止主观武断的弊病,保证研究工作的科学性,恰恰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如果历史研究不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就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形形色色唯心史观的支配和影响。在两种思想体系之间,“无所依傍”、“超然独立”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中指出:蔑视理论思维的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家遭到了怎样的报复。这说明了只重视史料的史学家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恩格斯说:“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接受了唯心主义,把错误的思维贯彻下去,就连这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会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

也有的人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会束缚研究工作,妨碍人们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这至

少也是严重的误解。马克思主义不但不会窒息独立思考 and 自由讨论,而且,正是马克思主义才使人们的思考富有成果,使讨论更加生动活泼。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 and 批判的,它要破除一切束缚思想的桎梏,从种种迷信和偏见中解放出来。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摧残科学事业,使学术界万马齐喑,一片萧条。自从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来,正确的思想路线战胜了错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占了主导地位,党的双百万方针得以贯彻,学术界进行了各种讨论,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呈现出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就充分证明:正是马克思主义才使独立思考 and 自由讨论有了保证。马克思主义不是独断的宗教学说,它不仅允许科学上各种不同观点的存在,而且认为,只有通过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当然,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目的都是为了揭示规律,追求真理。马克思主义是揭示规律最有效的武器。如果我们不愿意把思考和讨论变为随心所欲的幻想 and 无聊的猜测,那就不会拒绝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

建国以来,史学界在历史研究工作中,获得了很大成绩,也走过不少弯路。开始是为了纠正只重史料、不重理论的倾向而提出“以论带史”的口号,以后又为了纠正只发空论、轻视史实科学的倾向而提出“论从史出”的口号。这两个口号针对历史学界的不同情况,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简单的口号只反映事情的某个方面,语义也往往含糊不清而容易引起误解。

“论从史出”,从认识的根源来说是正确的。历史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它不是在某些理论家的头脑中凭空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历史实际。只有深入研究历史实际,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理论。“论从史出”对于纠正那种不肯在史实史料上苦功夫,只凭背几条语录就自以为是的,夸夸其谈,乱放空炮的错误倾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这个口号没有表明理论在研究工作中的指导作用,如果拿“论从史出”作为拒绝正确理论指导的借口,那是对史论关系的错误理解。

“以论带史”,语义更欠明确。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理论观点君临于历史实际之上,可以带着历史任意转,如果这样来理解,那末,这一口号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从“以论带史”理解为不很确切地表明了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那末,这一口号正好和“论从史出”相反相成,互为补充。我们坚持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原则,因此提出了“论从史出”;同时,我们又坚持理论的指导作用,因此提出了“以论带史”。理论来源于实践,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说,获得理论知识并不是都要亲自从实践中去总结,而通常是继承前人的成果,把前人创立的某一理论作为指导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准则。承认这种指导和承认这种指导是有原则区别的,拒绝以前人的正确理论作指导,只能使我们永远陷于蒙昧状态中。

我们主张“史论结合”,即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历史研究工作。遵循这条路线,社会主义新国的历史科学一定能够迅速发展,繁荣昌盛。

品种质量和调整

张元奎

产品的品种质量对于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努力增加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对于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

产品不对路,质量低劣,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物资供需不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如果中间产品和货不对路产品严重积压,社会急需产品短缺,或者产品质量低劣,一个只能当半个用,甚至不能利用,就必然会破坏供给与需求的比例关系。尤其在经济结构失调求成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产品不对路、质量低劣,必然会加剧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

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有加工工业和原材料、燃料、动力之间的比例失调,也有比较突出的是机器制造业。机器制造业之所以成为长线,有机器制造业的规模过大的问题,也有品种质量方面的问题。如社会需要的大型、精密产品和耗能低、效率高或某些特定需要的产品不足,有些简单易制的“大路货”有余;主机有余,辅机和零配件供应不足,等等。过去机械工业主要是为新建企业制造设备,为重工业本身服务,八字方针提出以后,生产任务严重不足。1980年,一机部工业系统在品种质量上大做文章,着力制造新产品,为节约能源服务,为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服务,同时,努力提高质量,进入国际市场。这一年实现利润的实际水平,不但没有降低,而且比1979年超过1.3%。

在农轻重的大比例关系中,现阶段农业、轻工业是短线,是最大发展的部门,但即使是这些部门,也有个品种质量问题。拿农业来说,过去单纯粮食,忽视了经济作物及多种副业(包括家庭副业);粮食里面,有些地方又只抓高产的杂交玉米、杂交高粱。轻工业总是短线,但轻工业产品中,有些也是长线,主要是货不对路,质量很差,一方面大量积压,一方面市场紧张。如香烟,总的产量不算少,但以品种来看,丙级烟、丁级烟大量积压,甲级烟、乙级烟奇缺,原因就是各争相建起来的小烟厂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低,而一些技术水平高的大厂因

原料不足,不能正常生产。纺织品也有相同的情况,高档宽幅少,呢绒皮毛缺,款式新、质量好、颜色鲜、工艺精的产品供不应求。至于电视机、手表、自行车、洗衣机、缝纫机、录音机、电风扇等等,这些产品数量都有很大增长,问题在于品种质量。在这些产品中,质量好的名牌货紧俏,质量差的产品滞销。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在品种质量上下功夫,市场商品供应肯定会有明显的改观。

品种质量问题还会影响到财政、信贷、外汇收支的平衡。对财政平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有些因品种质量而亏损的企业直接会影响财政的收入;一是有些企业货不对路或质量低劣的产品让商业物资部门收购了,积压在仓库里,而这些产品只要一出厂,就有相应的税金和利润交了,造成了财政的虚增收入。财政在当年动用这笔财政收入后,不仅埋伏着今后的缺口,而且为了使这些积压呆滞物资适应社会需要,就要进行一定的加工改制、报废回炉、削价处理,需要预算付出一定的代价。去年,通过清查仓库而报废的损失有几亿元。对信贷平衡的影响表现在:这些积压呆滞物资主要是占用了银行的信贷资金,使本来作为短期周转的资金,由工商企业长期占用而不能归还,形成“短贷长贷”,影响信贷收支的平衡。品种质量对外汇收支平衡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我国进口的产品,多属机电设备及耐用消费品,有些是国内不能生产的,这是属于质量问题,有些是国内性能差的,这是属于质量的问题。这方面的支出数字很不小。我国出口的产品,目前主要是农副产品、粗加工产品以及紧俏的原材料,机械设备出口较少。如果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情况就大不相同。有的产品通过更新换代,提高质量,即可出口。有的产品,变换花色,提高质量,销路即可增加。在这些方面,潜力是很大的。以上情况说明,品种质量问题与国民经济调整关系很大。品种质量不好,会加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品种对路,质量提高,则有利于调整国民经济,在真正增加社会财富的基础上,活跃市场,稳定物价,回笼货币,增加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应当说,随着国

民经济的调整,情况已经大有好转。但是,解决品种质量问题,还要花大力气,下大功夫。

第一,在发展生产时要使品种质量放在首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购买力和消费构成的变化,人们对于商品的品种、规格、款式、花样和质量等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说,在新产品、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竞相涌现的今天,任何一个企业,如果抱残守缺,不注意品种质量,将会走投无路,并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因此,必须克服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现象,确实切实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在品种质量上下功夫,使企业生产的每一个产品真正成为有用的、社会需要的物质财富。

第二,加强计划指导,搞好市场预期。生产是为了销售,品种对路,质量好,价格低,才能卖得快。如果不了解市场的要求,计划也就缺乏科学性和现实性,就会出现产销脱节,导致社会再生产的阻滞与破坏。因此,不论是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都必须搞好市场预期。

为了搞好市场预期,必须加强国家计划指导,各个部门和地区,都必须在国家统一计划和方针政策指导下,通过价格、利润、税收、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对生产的品种、数量、质量进行调节,建立情报和统计中心,及时将各地各种产品的生产、生产能力、质量、价格、销售、库存以及社会急需的缺门产品等情况进行通报,指导企业及时调整经营方向,注意品种质量。

第三,通过工业改组,推动经济联合。我国工业企业不少,但产品的品种质量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主要原因是产品结构不合理,各个部门和地区自成体系,互不协调,不搞专业化协作。以柴油油为例,我国本来就有上千个系列可以满足各种配套的需要,但全国有五十多个系列、二五百多个型号,系列重复,机型复杂,零部件品种繁多,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水平低。零部件损坏了不能互换,给用户带来极大的困难。有些先进企业开工不足,而那些货不对路、质量差、消耗大的企业却照常生产,因而加路了原材料、燃料、动力的紧张。针对以上情况,必须进行工业改组,对现有企业按照产品是否对路、质量高低、消耗高低、盈亏情况进行排队,有步骤地进行调整,通过联合和改组,改变产品结构。



关于农民战争中平均主义问题的讨论

近几年来,史学界就农民战争中平均主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场讨论是关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有什么样的思想武器的问题。已发表的文章主要有:董楚平的《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1980年第1期《历史研究》)、徐祖根的《试论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1980年第4期《历史研究》)、周良霄和张德信的《关于农民战争任务和作用问题的商榷》(1980年第4期《历史研究》)和董楚平的《论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封建特权主义》(1981年第1期《学术月刊》)等等。

(一)平均主义的历史作用。一种意见认为,在革命初期,平均主义用来对付旧的封建统治秩序,有“破”的作用,可以解除人民的拥护;当革命进入高潮后,平均主义用于人民内部,解决社会生产时,比封建主义为害更甚。他们以《天朝田亩制度》为例,说明它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把“平均主义”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太平天国在京城里搞的是拆散家庭,消灭私有制。这并不是平均主义问题,而是在搞“共产主义”。农民、手工业者反对《天朝田亩制度》并不是反对其中的平分土地、人民平等的平均主义,而是反对拆散家庭、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他们指出,单纯的农民战争提出的平均主义,并不要求消灭封建特权制度,建立绝对平均主义的小农社会,而仅仅要求推翻旧王朝,夺取地主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建立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新的封建王朝。因此,不能说平均主义对农民战争所起的作用只有消极一面,更不能说它是反动的。

(二)平均主义是否会否导致农民战争的失败。一种意见认为,平等观念、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的准备阶段和爆发阶段起过很大的动员组织作用。但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一次农民起义能以平均主义作为思想武器而取得最后胜利的。例如,黄巢、李自成的失败,固然与其流寇主义分不开,但是,流寇主义的思想根源是平均主义。再如,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在二十多年的农民战争史上可谓发展到最高水平。《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一个人间的平均主义“天国”,但这“天国”却遭到人民的反对,最后也失败了。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说平均主义导致黄巢、李自成和太平天国三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的失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平均主义不仅不是流寇主义的思想根源,相反,流寇主义却妨碍了平均主义的实行。李自成的平均主义口号喊得比朱元璋响,但招抚流亡、分给土地、平均赋税等却远逊如朱元璋。一败一胜,两相对照,足以说明平均主义不会导致农民战争的失败。他们还认为,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开始与相反是兴奋剂,倒不如说是强身丸,后来不但是腐蚀剂,相反的是抗腐素。虽然这种抗腐素的效力不显著也不长久,但毕竟可以延缓农民军的腐化堕落过程,使它更多地得到农民的拥护。诚然,中国旧式农民战争,从来没有建立过与封建主义的封建政权相对应的平均主义的农民政权;他们建立的仍是封建主义王朝,但是,这个新王朝比旧王朝能搞一点平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一点要求。

(三)怎样理解革命导师对平均主义的批判。一种意见认为革命导师经常批判平均主义。例如斯大林说:“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心理。”毛泽东指出:“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列宁在评价民粹派平均土地法案时说:“土地‘平均’使用制……小生产者的这种平等思想是反动的,因为它不是用前进的办法,而是企图用后退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尽管平均主义危害很大,不断受到革命导师的批判,但是它在我国史学界仍很幸运。他们认为,其原因是:(1)左倾思潮作祟;(2)我们习惯于拿先验的思想作为判别的尺度,而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3)缺乏政治民主与学术自由;(4)小生产者的实践力作怪。

另一种意见认为,革命导师确实经常批判平均主义,但他们批判的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平均主义、批判那种认为通过平均主义的分配就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批判那种企图建立绝对平均主义的小农社会的思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平均主义的想法和做法,他们是肯定的,认为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革命导师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平均主义,对不同意条件下平均主义作了完全不同的评价。

(四)封建时代的农民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其理由是:(1)农民阶级所处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必然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2)在我国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中提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它标志着农民已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把封建时代的农民上升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高度是不妥当的,缺乏理论根据的。(1)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其他任何社会意识一样,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关系,它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作为其产生的基础。因此,民主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只能产生在资本主义已经有所发展,并且有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要求的时候。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当资本主义尚未萌发的时代,是不存在民主主义思想的。(2)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在资产阶级还没有产生的封建时代里的单纯农民运动,不可能产生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3)民主主义的基本内容是自由、平等,它要求结束封建专制制度,废除封建等级特权,保证人们在政治生活及经济关系中的平等权利,保障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因此,我国封建时代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说法,是难于成立的。

(摘自1981年第2期《学术月刊》)

